

韩凤鸣 宋开之 编著

中国传统文化

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
都有它的昨天、今天、明天。

本书所论的重点在中国文化的“昨天”，即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
为主要对象，以人性论、自我论、性格论、实体论、价值论、模式论等六大版块为基本内容，
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和评价。

书作为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题材，意在给大学生提供一个了解祖国悠久、丰厚文化遗产的简明文本，
使之对于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所把握，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所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河海大学出版社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韩凤鸣 宋开之 编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韩凤鸣,宋开之编著.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2004.12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ISBN 7-5630-2062-4

I. 中... II. ①韩... ②宋... III. 传统文
化—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735 号

书 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书 号/ISBN 7-5630-2062-4/G·557

责任编辑/施 萍

特约编辑/贾克香

封面设计/黄 炜

出 版/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南京市西康路1号(邮编:210098)

电 话/(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发行部)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13.5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0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0.00元(册)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编写委员会

主 任：孙其昂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长青 王集权 叶鸿蔚

孙其昂 吴 远 金林南

高 燕 韩凤鸣

总 序

这套教材是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批系列教材,作为多年来专业建设的成果,现在把它们展示在众人面前,既是接受大家的检验,也是为进一步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提供规范性的教材。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河海大学最早设立的人文社科类专业之一。早在1964年,河海大学(当时称华东水利学院)就招收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理论)专业的学生,专门为全国高等学校输送了一批政治理论教育师资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河海大学(当时称华东水利学院)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理论)专业本科班,为当时全国重点大学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首批高校。1985年举办思想政治教育专科升本科班,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科,主要为江苏省的中学政治课培养师资人才。在上述办学的基础上,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点;1997年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和两年制专科升本科学生;现在每年招收四年制本科学生、两年制专科升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

多年来,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建立了合理的课程体系和培养体系,制定了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断发展,并带动了其他相关专业的成长。自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硕士点后,该专业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由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到1996年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扩大了学科面;之后,由该硕士点发展出三个硕士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和高等教育学;2003年又进一步发展出三个硕士点,即科技哲学、行政管理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自身也得到发展,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博士点。研究生培养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研究方向形成特色,导师队伍素质高、结构合理、形成梯队,毕业生质量优秀。

该专业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在本科生培养上,根据社会需求和“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目标设置课程,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三个技能培养(外语、计算机和社会交往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深厚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多的深造机会。毕业生在机关、企业、部队、高校、中学、报社、电视台、电台等单位工作。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表现出积极向上、基础扎实、知识

丰富和善于交往的特点,深得用人单位的好评。在研究生培养上,坚持立足专业、多学科结合培养人才的思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行政管理、大众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结合起来,实行导师负责与集体指导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培养体系。通过“严格要求”,硕士毕业生能做到志向高远,视野开阔,知识面宽,适应性强,团结协作好,在就业过程中具有竞争力,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优异成绩,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重视教材建设,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校特色的专业系列教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必须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材。这次出版的五本教材,即《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伦理学通论》、《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和《社会学概论》,经过主讲教师多年试用、反复修改,既积累了教学中成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经验,又吸收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水平。这套教材凝聚了编者们的长期艰苦的努力,也包含了该专业广大教师在专业建设实践过程中的辛勤劳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生乃至本科生也为教材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这套教材实际上是整个专业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努力的结晶。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一个新的专业,还在发展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一定会日益丰富。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材也将随之不断改进。我们期待这套教材在出版以后会得到大家的关爱,并且和我们一起为进一步提高教材质量,不断完善教材内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共同努力。

孙其昂

2004年10月1日

于河海大学清凉山校区



前言

很早的时候人类就在探索人生和宇宙的问题,这些探索是积极、可贵的。但直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许多古人的信念才被证实为猜想,许多古人的方法和结论被证明为不科学和不适宜的。随着文明的进步,一代一代被认定为合理的理论,或被当时的“科学”证明了的东西,又被更先进的科学和理论证明为不准确,抛弃的过程在不断地进行着。后代人在嘲笑前代人的时候又被更后来的人纠正,以至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准确的和测不准的;进一步还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代与一代相比,只是有一点点变化或“进步”,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只是变化,不是进步,嘲笑古人的行为是“五十步笑百步”。总体看来,我们对那个终极的东西——我们隐隐感觉到、期望有的东西——始终是模糊的,或者说那根本是个猜想,我们的文化在猜想中“进步”。由模糊到较为清晰是文明的理想,传统文化就是在这个不断试错的进程中发展的。

人类社会在追求发展,这种“发展”是否就意味着“进步”?它导向何方?这种历史发展逻辑的“清晰”参照了何物?那种根本的“真”或文明依据的真理在哪里?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着的、谁也不能准确把握方向和确切位置的地方,人类在思考着大问题以及无数的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所做的只能是猜想。尤其在古代,这是传统文化的一般经历。

传统文化是如何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种探索,尽可能找出“准确”的答案,但这个文化的未来向何处去,我们连猜想也没有勇气,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过程。当人类对自己及宇宙事物的起源也不十分清楚的时候,寻找它们的目的和意义当然都是猜想,最可能是自我意识的循环,人类在不知不觉的假设中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文明的成果在“人脑”的假设的目的中开始,又在不断运动中进行着自我诠释。这样看来,人类在传统中、因而也是在猜想的宇宙中,开始的时候就掉进茫茫大海,找不到位置和方向,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人类在潜意识里恐惧和彷徨着,他期望能抓住一件东西——传统锤炼的真理,有所攀缘,彼岸出现了,那是再好不过的,如果彼岸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而身边没有攀缘物或拯救者,就只能制造幻想了,传统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制造了无数的幻想。这些攀缘物、拯救者、幻想之物都是一类东西,这些近在眼前的幸福快乐让人可望可及,让人类欢喜和骄傲,但也可能走向深重的迷失。在迷一样的

文化流变中,人们都会抓住这样一些堪称幸福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抓到的人是不幸的,他在世间孤独和苦恼着,但在这样丰富的传统中,绝对的孤独者往往是没有的,只要他在人间,总会记起一些东西和留恋一些事物,譬如对事业、金钱的崇拜,以及对诸如情感、道德、政治的信仰等。小木棒可以变成森林,几茎小草也能衍生为绿洲,许多人就赖以之生存。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人的家园。中国儒家看到了人生和社会丰富、复杂、意义的一面,于是费尽周折,想用自己的办法、依照自己的理想把世界治理好,或依赖礼法制度,或讲伦理情感,或讲天人合一的哲学,等等。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宗法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稳固的农耕经济基础和极端的君主专制之下的宗法型社会及其伦理型文化范式,形成了特殊的人性论、性格论和自我论的设计与认同;宗法与专制相结合而形成了政治伦理化,同时也形成了伦理政治化,如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等;对天时地理的依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认为事物的一般存在是与整体或大全息息相通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与宇宙或本体相通的。道家思想是“极高明”的,它的彼岸性比较明显。但老子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坚决地把他的“道”拔高到形而上的绝对位置,他尊重着这个变幻的世界与道的紧密关系,没有去崇拜语言及其制造的逻各斯。从道家看来,当人们把“本体”从现象中提升而独立出来,这个形上的本体也就成了庸俗的东西,提升的过程是事物悲剧的进程,当形而上出现的时候,就是道丧失的时候,也是人迷失出路的时候。我们现在早已经违背了道家的意思,所以我们很难认识老子,老子之所以还在遥远的地方闪耀,是因为我们还在回头观望,我们还在偶然间观赏路边的风景,或者我们在睡梦里不知不觉走上从前的路。佛教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慈悲心灵,使中国人的生存视野大大拓展了,乐生的中国人进一步看到人生也是苦的,而苦与乐是不二的,只要人们去修“出世间法”,就能得到彼岸的解脱。中国禅宗更将此岸与彼岸联接起来,即世间得解脱,认为只要你当下认取自我,以平常心处世,时时处处都是解脱境界。儒、道、释三家对人生社会看法的差异,代表了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是三个终极家园。一般来说,中国人就在这几种精神家园中生活着,或此或彼,或出此入彼,不会偏离太远。

作为中国人生存智慧的传统文化,不论是儒、道还是佛教,在理论上都是自成体系的,在实际中都有其独立的生存能力。它们在中华民族的土壤中生存,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共通点——去苦求乐的乐生精神,力图向着各自“善”的方向发展,“为人生”的目的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乐生精神在面临人生苦难时,都有自己独特的应付方法。就如大热天,中国人都想到要避暑,这是一致的。儒家的态度是现实的,在家里摇着扇子或装个空调,一边还在干身边的活;道家做得彻底一些,放下活儿到林间、山里或海滨避暑,那里确实是一片清

凉,但这个“逍遥”离人太远;佛家的方法似乎最为彻底,他们既不摇扇子、装空调,也不上山下海去避热,而是就在当下“心静自然凉”。这几种方法对避暑都是管用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朝着自认为“好”的方向去想、去做,力图达到与自然和人的调和,最终得到心灵的调和。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总的来说是崇“善”的,当然这个“善”的意义是丰富的。西方的思想就很不一样,典型的如叔本华和尼采,比如大热天吧,叔本华也感到了热的苦,但他没想到避暑,还是在太阳底下努力地苦熬、叫苦,因而人生对于他来说是苦和无奈的;尼采在大热天没有想到去避暑,或者说不屑去避暑,他蔑视太阳,他用自由的征服来对待烈日,尽管留下一大堆“反思”,但日常生活还是一塌糊涂。跟生活作对,因而也是跟自己作对,总之等于自杀,这不是“善”的文化。

无论知识如何丰富,哲学如何发达,在无边的自然奥秘面前,人类的智慧都只是沧海一粟;无论科技怎么进步,征服自然的力量如何强大,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人类的力量都是藐小的,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只是自然生命中的浮光掠影。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让人回到人生,生而顺命,乐而事天,在天地的中心理解天地,在天人合一中善待自然、尊重心灵,在圆融思维中遵守统一性和完整性法则。

乐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想循自然性命之理,不要与各种“自然”为敌,但科学技术不可遏止的发展让人回头望一望的时间都少了,人窒息在各种分离的生命形式和情绪波动中,然而,人的生命和情感还在它的生存本能中,还在向往着旧日的宁静和圆融,一如既往地思慕着其自然的存在。在现代的人“花费时间”创造世界与中国古人“享受时间”来体悟生命自然的生存对照中,现代人消耗了许多生命,浪费了许多心情,结果却很难令人满意。现代人曾一度滥用改造自然的能力来无节制地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按照自己的欲望挥霍资源,使许多物种消失,森林枯萎,草场退化,河湖污染,空气浑浊,疾病流行……。人类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开始怀念古老的格言、古老的心情、古老的花园。

当苏格拉底走到人生最后一步时,他仍然有坚定的神信,这个神信代表着古典的信仰:“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但我们现在很难见到神了,古老的上帝早已失色。当老子西去时,他是这样想的:“道可道,但已经没有人听道了。”所以还是走吧。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可能会这样说:“我们不需要孔子、老子等等,我们活得很好。”人们活得很好,但“人”也在渐渐消失。现在,我们需要时常回头看一看,看看古人的关怀。

韩凤鸣

2005年6月1日

目 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章 中华文化的多元发生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 (1)

第二节 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 (11)

第三节 中华文化根植的经济土壤 (19)

第四节 中华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 (26)

第二章 价值论: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 (33)

第一节 文化价值意识的构建 (33)

第二节 儒家伦理本位的价值体系 (40)

第三节 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变化 (50)

第三章 人性论:中国文化的人性设计 (59)

第一节 儒家的人性理论 (59)

第二节 道家的人性论 (71)

第三节 佛教的人性论 (78)

第四节 中西文化的人性论比较 (82)

第四章 性格论:中国文化的性情品格 (87)

第一节 性理与情理思维 (87)

第二节 伦理情感的设计 (97)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意志品格 (105)

第五章 自我论:中国文化的个体与整体 (113)

第一节 文化与自我 (113)

第二节 人情主义与自我设计 (120)

第三节 中国文化形态中的个人 (128)

第六章 实体论:中国文化的伦理政治 (138)

第一节 中国伦理政治的多维涵义 (138)

第二节	中国伦理政治的结构和社会意识形式·····	(148)
第三节	中国伦理政治的特点·····	(156)
第四节	中国伦理政治的功能·····	(162)
第七章	模式论：中国文化的圆融思维 ·····	(171)
第一节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发展历程·····	(171)
第二节	道家和道教的回归之路·····	(185)
第三节	中国禅宗的总摄性和圆融思维·····	(193)
后 记	·····	(201)



第一章

中华文化的多元发生

人作为自然——社会的双重存在物,是在自然场^①与社会场相互交织的环境中创造文化的。“自然场”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界;“社会场”指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结成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可大致分为经济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由于人类的生态环境是自然场和社会场的整合,所以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进行剖析^②,厘清一种文化的具体发生过程,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自然环境”是指被人类改造、利用,并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它与人类相互作用,构建了文化的地理环境,且逐渐渗入人类的主观因素,直接影响或决定着人的躯体、肤色、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社会经济环境”是指人类加工、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所形成的一套生产条件,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经济环境”既是广义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又是狭义文化(观念形态文化)根植的土壤和赖以生长的物质前提。古人云:“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正是对观念形态文化与经济生活相互关系的素朴表述;“社会制度环境”是指人类创造出来并为其文化活动提供协作、秩序、目标的组织条件,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结合而成的体系。社会制度环境作为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现实社会的基本态势,既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狭义文化赖以生长发育的社会组织前提。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

人类的演生是自然高度发展的结果,而人类的出现又是人类文化形成的首要条件,因而,文化和自然条件(环境)是不可分离的,“文化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

① “场”是一个从物理学借用来的概念。其原意是在粒子相互作用中起媒介作用的实体,它分布在空间或部分空间,如重力场、声场等。

②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10页。

密不可分,恰如(且与此有关)心灵与身体密不可分。”^①在文化生态学与文化地理学的视野中,看来中国文化是由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而中国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的不同,则是由各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所致。

一、文化生态学与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传统文化

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又是生态系统的干预者和调节者。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具有愈益精密的技术系统和日新月异的观念系统的人类,愈有能力突破自然环境的某些限制,享有更加广泛的自由,社会场将更加强有力地影响文化生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场的影响力可以被忽视,它实际上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渗透进人类生活,与社会场有机地组合成“文化的生态环境”,提供人类栖息生养、创造文化、孕育文明的条件。因此,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也就是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并与诸文化现象有机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认识。

难能可贵的是,在我国古典文化遗产中,我们的先哲们很早就全面关注了自然场和社会场,把探索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目光正确投向文化生态三层次。其中《礼记》就有一段关于民族划分的议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②《礼记》作者在进行民族划分时,综合考察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诸种因素。据此,将当时的“天下”作出“中国”与“戎夷”之分。“中国”(指中原)是农耕经济的文明之邦;“戎夷”(指周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采集经济或游牧经济的野蛮之邦,所谓“不火食者”、“不粒食者”。《礼记》作者指出:“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③这种从文化生态的差异来区分民族的方法是理性主义的,而非种族主义的。正是从这种观念出发,当“戎夷”接受了农耕文明,便被认作文明人,不再被视作野蛮人,也即所谓“由夷变夏”。

文化生态学是“文化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④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在于与周围环境进行新陈代谢,生物的居住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不断进行交换的系统。生物及人类同环境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中国古人便有“居

① [美]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页。

②③ 《礼记·王制》。

④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8页。



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①等环境决定人性的观点。《周易》还提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全面审视生存环境的主张。中国古代许多朝代都设置过虞、衡等环境保护机构,如《周礼》载:先秦即有山虞、泽虞、川虞、林虞等官职,负责制定保护山林、川泽的政令,并巡视林麓和川泽。可见,人类同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协调问题,为中国从事生产劳动的百姓、从事精神生产的文化人、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的朝廷所共同关心。当然,这种关心还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与之相伴,现代中国人却做过不少破坏生态平衡、逆天而行的傻事、蠢事,过度放牧、滥伐森林、围湖造田等等,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在国外,注意人类生存环境的思想也很早就产生了,1377年,著名的中东伊斯兰学者、《历史绪论》的作者伊本·赫尔东就已提出文化生态概念,强调人类文化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直到近代,对生态问题的研究才真正成为科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年)首创生态学。他在《有机体普遍形态学》一书中说:“生态学是动物对于无机及有机环境所具有的关系。”从而把生态学确定为一门探讨有机体与其外围环境相互适应状态的科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生物学家阿瑟·乔治·坦斯利把生物群落及环境因素放在“生态环境”中加以研究。他在《植物概念术语的使用问题》一文中指出:“有机体不能与它们的环境分开,而必须与它们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产生了生态经济学;与文化学结合,产生了文化生态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书中指出:“生态学主要的意义是‘对环境之适应’”。对大多数动物而言,适应是以它们的身体特征来达成,而人类的适应主要是靠文化的方式来达成,这之中,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俗语道“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各地种植的作物、饲养的牲畜、家禽,以及捕获的鱼类、野生动物,采集的植物各不相同,加上历史的传统各地有别,因此各地的食物组成、制作方法、使用的佐料、传统的风味等也各不相同,这充分反映了饮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某种饮食文化中形成的饮食习惯与习惯有很强的继承性。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客观环境已经改变,但仍有不少人保持原来的饮食习惯。例如,我国南方人以米为主食,北方人以面为主食;汉民肉食以猪肉为主;信仰伊斯兰教的却禁食猪肉。西欧、北美虽吃面食,但不是蒸成馒头,而是烤成面包,肉食以牛肉为主,并佐以牛奶和黄油。在副食品上,各地的差别更为鲜明:如四川、湖南、贵州等地多喜吃辣,而东北的朝鲜族也喜吃辣。喜欢吃辣,主要与当

^① 《荀子·儒效》。

地气候湿润,冬春阴湿寒冷有关,这种气候易使人患风湿性关节炎,经常吃辣可以驱寒避湿,对健康有利。山西人爱吃醋,北方不少地区农村居民爱吃腌酸菜,这是因为我国北方,特别是黄土地区土壤中含有大量的钙,通过饮食易在体内引起钙质积淀,形成结石,多吃酸性食物有利于减少结石等疾病。

总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类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生态’(或‘称文化背景’),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赖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①人类与其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此之谓文化研究要从生态研究入手之缘由。

把中华民族数千年间诞生、成长、创造文化的这片空间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景加以考察时,又会发现一个明显特征——中国幅员辽阔,回旋天地开阔,形成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当东北松花江上将近中午的时候,帕米尔高原还是旭日东升的早晨;当鄂伦春族猎人在林海雪原中追猎鹿群的时候,海南岛的黎族姑娘也许正在茫茫椰林中收摘椰子”^②。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③。经秦汉、唐宋历代先民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元明清时代的融合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东西跨度 60 多个经度,南北达 50 多个纬度,方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而雄居世界第三位。中国文化就滋生繁衍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中国西北抵帕米尔高原的东麓,从关中出玉门关,纵横数千公里的荒漠和连绵起伏的山地、雪峰,加上险恶的气候,自古有“风灾鬼难之域”之称,使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充满险阻。从西汉开始,人们历经千难万险打通了从中原腹地通往西域的道路——丝绸之路,从此,在这条中西通道上留下了使臣、商贾、僧人、教士、军人的足迹,也留下累累尸骨。在漫长的古代,这浩瀚而干旱的地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西北地理极限。中国的北部是广漠无垠的草原,其东北则是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北极冰原,虽无高山大川的障碍,要想穿越也困难重重。长城内外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斗争融合的场所,其外缘以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为限,再往北就人迹罕至了。中国的西南耸立着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许多山峰超过海拔 7 000 米,犹如一道道插入云霄的冰川,阻隔了中国与南亚的交通,逾越这一天然之屏障,较之西域的流沙、北部的荒原更为艰难千百倍,

① 冯天瑜著:《中华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9页。

② 王会昌著:《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197页。

③ 《尚书·禹贡》。



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只能绕道丝绸之路间接交往。即使中国内地通往西藏腹地的交通也充满艰险,直到唐代翻越重重雪峰、峡谷的“唐蕃古道”才得以开通。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山水相连,但南中国在古代相当长时期开发较迟,加上热带丛林瘴疠盛行,地旷人稀,被视为苗蛮化外之地,与中原交通往来在隋唐以前很不畅通。中国的东部是浩瀚的太平洋,自黑龙江东部沿海有延绵2万多公里的海岸,沿海的交通早在先秦就已兴起,唐代以后日益发达,只是大多局限于近海,明代郑和下西洋可谓古代空前绝后之举,但并没导致中华民族大规模向海洋发展。

地理环境通过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等等中介,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时,就有必要从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的剖析入手,进而探讨中华地理背景的诸特征与中华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我们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具体分析,就不能从纯地理学的角度,而应从地理学与文化学相关联、相交融的视角,即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二、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地球是人类的故乡,也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载体。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地球演化出了各种生物,最终演生出了万物之灵长的人。《尚书·泰誓》说:“惟天地万物之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类——“宇宙的精华”^①——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超越自然,能够认识自然,并按照自然的意志改造自然,“人之巧乃可造化者同功乎”^②。自此,我们的地球及周围的空间变成熙熙攘攘、充满生机的“人的世界”,也即“文化的世界”。

人类从动物界离异出来,始终承受着自然和社会给予的多重压力。人类的最早祖先,不能够主动地去选择条件最好、最适宜于生存的环境。那些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初民,就不得不努力克服困难,甚至被迫迁徙。即使那些生活在优良环境下的初民,他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加之为生存,各部族间经常进行战争,互相侵害,因此初民的生存环境是极为艰辛的。

动物是在死亡的威胁下,通过机体的变异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条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界“天演之公例”。而人类作为有机界进化长链中的一个环节,是这种“天演之公例”的产物,同时又超越其上,具有鲜明的自为能力。人类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别种生物所缺少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仅接受自然的选择,而且因其有意识,有智慧,会劳动,还可以选择自然;他们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台词。

② 《列子·汤问》。

主要不是依赖身体器官的变异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不断改革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来积极地增进对环境的驾驭能力,并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发展自己的智能,由环境的奴隶变成环境的主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当然,人类即使得到高度发展,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地处置自然。经济增长、社会及各领域的进步,都受到自然资源的潜在限制,那种认为环境的负荷能力永无匮乏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罢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员,只有遵循自然界本身的规律,才能心想事成,否则便举步维艰,甚至受到自然冷酷无情的惩罚。人类正是在不断克服环境带来的压力,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赢得进步动力的。

中国古人对人类必须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据《国语》载,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把渔网割断,扔在水里,并对宣公说,春夏鸟兽鱼卵怀孕,不应捕杀,树木发芽生长,不宜砍伐。野生动物得到繁殖,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孟子也有类似见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①这里阐述的是:只要不违背农时,那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鱼网不入池塘,那鱼鳖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定时,那木材便用不尽。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使老百姓供养活人、安葬死者不致感到什么不满足。

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的“因势利导”思想,顺应自然使用人力的思想,以及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远见卓识。现代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古人,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破坏的严峻形势,为此,认真领会先哲们这些充满智慧的话语,是大有裨益的。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大约经历了“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如果说,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人较完整地经历了这三个认识阶段,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或称人与天)的分离阶段,即使春秋时期的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战国的荀况、唐代的刘禹锡论证过天人相分,但就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点在中国占居优势,天人相分观点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屡经坎坷是互为因果的。当然,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若干合理成分,对于面对生态危机的后工业社会又有着特殊的启迪意义,已经并将进一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人类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是人类思考和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

^① 《孟子·梁惠王》。

